

1307

南平文史资料

第十五辑

南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南平文史資料

第十五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
南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

目 录

· 闽学研究 ·

游酢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

.....高令印 (1)

关于游酢研究的几个问题

.....陈其芳 张火友 (15)

游酢与杨时比较谈.....刘光舟 (31)

论游酢治学的特点.....林麴起 (41)

游定夫与扶沟大程书院.....游恒派 (49)

浅析《四书集注》中的游酢语录...吴 更 (57)

闽北书院与理学传播.....程 楷 (67)

在南平五区剿匪追忆.....刘德贵 (73)

解放初期南平银行建立概况

.....霍庆林口述 朱学新整理 (84)

接管南平电厂二三事.....	王泽民 (92)
陈一堂事略.....	陈学廷 (99)
为南福铁路建设出力的一支支前民工队	
.....	邓福春 (106)
怀南平.....	郭 风 (110)
延平廖氏姓源考.....	廖木荣 (114)
在私立建华中学读书的回忆.....	邓福春 (122)
颜学回与《民主报》.....	卢元辉 (126)
东冶探微.....	陈敏 陈建生 (133)
南平第二十五兵站分监部在闽浙战	
役中的兵站设施.....	陈长河 (151)

游酢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

高 令 印

宋代福建的理学是中国南方文化的基础，由此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复兴和发展起来，逐步形成封建社会后期的光辉灿烂的[中]国文化。福建理学的创始人主要是游酢和杨时。他们同时师事河南理学家程颢、程颐，学成回福建等南方地区发扬理学，创建福建理学派别。但是，后世却说“道南第一人杨时”，而游酢则罕为人知。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，是未实事求是地对游酢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所致。我在《闽学概论》等论著中曾论及这个问题，现再进行较深入的探讨。

一、首要洛学正宗传人

在程门四杰中，一般称游(酢)、杨(时)、谢(良佐)、吕(大临)或游、杨，都是把游酢列为首

位。这是有所本的。在《朱子语类》里有这么一段对话：“问：‘吕、游、杨、侯四子之说孰优’（朱熹）曰：‘此非后学所敢言。程先生于游称其颖悟温厚，谓杨不及游’”（卷101）此即程子说：

“建州游酢，非昔日之游，固是颖，然资质温厚。南剑州杨时虽不逮酢，然煞颖悟。”（《二程集》第45页）称其“灵利高才”（同上第28页）。《宋元学案》说：“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遗经以倡天下，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，游、杨、谢、吕为著。”

游酢于二十岁时在京师见程颐，程颐即谓“其资可与适道”（《御史游公墓志铭》，《杨时集》第733页）。六年后程颢办学即召游酢任教职，游酢即师事之，“尽弃故所学而学焉”（同上）放弃词章之学而改为理学。再过三年，游酢带杨时一起至河南颍昌，杨时才开始师事程颢。程子谓“吾道南矣！”（《诸儒论述》，《游定夫先生集》卷首）说的是游、杨二人载道南归。杨时在信中跟游酢讨论编辑二程语录时说：“先生之门所存，惟吾二人耳，不得不任其责也。”（《与游定夫》，同上第457页）后人亦曰：“孔孟之道得二程而明，故朱子以二程继闻知之统，二程之教得

游、杨而广，故先于以游、杨为亲炙之宗。”（清王杰《序》，《游定夫先生集》卷首）

游酢在学术上依倚师门，沿着二程的思路对理学进行疏理和发挥。他同二程一样，以“理”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。他说：“斯理也，仰则著于天，俯则形于地理，中则隐于人心。”（《荐山学案·荐山遗文》，《宋元学案》卷26）这就是说，理是天、地、人的本体，是宇宙的根源。又说：“道者天也，道为万物之奥，故足以统天；仁者人也，仁为众善之首，故足以长人；犹之万物发育乎春而震。”（《易说》，《游定夫先生集》卷2）此谓理在天为道，在人为仁，皆为生育发展之意。游酢的这一思想源出于二程，并为朱熹所继承。程子说：“仁者，浑然与物同体。”（《二程集》第16页）朱熹说：“仁者心之德，程子所谓心如谷种，仁则其生之性是也。”（《孟子集注·告子上》）程朱视仁为人心之根本德性，是人心所具之天理，而天理的本性是生生不息的，故仁为生之性或生之理。《易·乾卦·卦辞》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，指的是宇宙变化发展的道。朱熹认为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便是元、亨、利、贞”（《朱子语类》第107页），故仁是“万化之机轴”（同上第

109页)。可见，二程、游酢、朱熹的宇宙论是一致的。

上引游酢谓理“隐于人心”，即人先天本能地具有天地万物之理。他进一步指出，人的后天的私欲却把先天本能所具有的天地万物之理蒙蔽了。他说：“而民之迷日久，不能以自得(天理)也。冥行于利害之域，而莫知所尚。”(同上)因此，只能去人欲，才能存天理，存天理，即存人之所以为人之理——仁。他说：“仁人心也，不可须臾离也，犹饥之于食、渴之于饮，一日闕之则必颠仆饥蹙而殒命矣。人心一日不依于仁，则不足以为人焉。”(《论语杂解》，《游定夫先生集》卷3)又说：“理也，义也，人心之所同然也。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心所同然者而已。”(同上)

去人欲、存天理的基本方法是变化气质，实现仁性的复归。游酢提出“治气养心行己接物”(《荐山学案·荐山遗文》，《宋元学案》卷26)。游酢的这一思想，本于子思的《中庸》和张载的《西铭》。程颢说：“游酢于《西铭》，读之已能不逆于心，言语之外，别立得这个义理，便道《中庸》矣。”(《二程集》第403页)对此，真德秀解释为：“明道先生称其能求之言语之外，近世学

者或未喻其旨。愚谓《中庸》纲领，在性、道、教三言，而终篇之义无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。《西铭》纲领，亦在其体其性之二言；而终篇反复推明，亦欲人不失乾父、坤母之所赋予者，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。故游先生以为即《中庸》之理也。岂不信哉！”（《诸儒论述》，《游定夫先生集》卷首）真德秀确切地指出，游酢跟二程一样，认为《西铭》所论述的是《中庸》之理，即乾父、坤母所赋予人的“天地克肖之子”。此亦称“天地之性”、“天命之性”、“义理之性”，与“气质之性”相对应。理学家们所谓义理之性，即把仁、义、礼、智四德看作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，至善至纯；而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杂，故有智愚、贤不肖之别。这即是他们所说的“存天理、去人欲”的理论根据。上引真德秀所谓“性、道、教三言”，即《中庸》之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；所谓“体其性之二言”，即《西铭》之“天地之塞吾其体，天地之帅吾其性”。

游酢基于二程把理与心看成是一致的观点，进一步把理与仁、义联系在一起。仁即心仁，即心中所想符合天理。因此，心仁即去人欲，依理行事；去欲得仁，则知理。人应该做的就是义。

什么是应该做的呢？凡是符合天理，服从三纲五常的，就是应该做的。

游酢所讲的“行己接物”，是立身处世之道。他特别强调戒慎诚身。他认为，“能戒慎于不睹不闻之中，则上天之载可循序而进矣。”（《诸儒论述》引，《游定夫先生集》卷首）戒慎是一种心存敬畏，不染杂念的精神状态，由此境界即可达到诚身。他说：“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学至于诚身，则安往而不致其极哉？以内则顺乎亲，以外则信乎友，以上则可以得君，以下则可以得民矣。”（朱熹《孟子集注》引，《四书集注》第282页）在他看来，达到诚身这个为学的极限，就能人心与天命合一，正确处理与亲友、君民的关系，具有至善的道德境界。

二、宋学中坚

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宋学与汉学之分。它们分别代表了两个文化时代和两种治学思维方式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经部总叙》说：“要其归宿，则不过汉学、宋学两家互为胜负。”汉学亦称朴学，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，在整理古籍和辨别古籍真伪上作出巨大贡献，但是由此也形成为

烦琐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和思维方式。宋学即宋明理学，“为宋学者，不第攻汉儒而已也”（汉藩《宋学渊源记》）。宋明儒者为学，重在发挥经书中的义理，由此形成一种学以致用、传统为现实服务的学风和思维方式。

宋学的这种学风和思维方式的形成，游酢起了中坚作用。先是二程在《经说》中竭力抬高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在经书中的地位，抛弃原注，按己意发挥，并移易《大学》章次。接着是游酢“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说经”（《序》，《游定夫先生集》卷首）。他所撰写的《易说》、《中庸义》、《论语杂解》、《孟子杂解》等，都是宋学的典型著作。在他的这些著作中，“足资深发者固已多矣”（同上）。对游酢在这方面的贡献，方宗诚说：“自二程夫子起，始独得子章句笺疏之外，而见圣贤立言之本心。先生（指游酢）及同门诸子，互有以发明之，于是经之大体大用始著。朱子继起，乃合汉唐之训诂。宋诸儒之义理，择之极其精、语之极其详，由是圣贤之精义始如日月经天、江河行地，布帛菽粟之切于人生日用而不可离。譬之农焉，朱子则陈列修治面为之疆畎者也。然非始有既勤敷蓄如先生（游酢）辈

者，则朱子一人，又岂易芟柞而耕获也哉。”（《诸儒论述》，《游定夫先生集》卷首）这就是说，如果没有游酢等人的“既勤敷蓄”，就不可能有朱熹的“芟柞而耕获”。方宗诚的这种见解，确实说中了游酢的思想，是由二程到朱熹集大成的宋学（义理之学）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必经阶段。

事实正是如此。游酢对经书的诸多新的见解，朱熹在《四书集注》和其他著作中多有采用。上引游酢关于“诚身”一段，朱熹《孟子集注》采用（参见《四书集注》第282页）。再如，朱熹在注释《论语》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治其身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”一段时，即采用游酢的解释。游酢说：“三代之学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。能是四者（按指上引《论语》四句）则于人伦厚矣。学之为道，何以加此。故《学而》一篇，大抵皆在于务本。”（《四书集注》引，第50页）朱熹据游酢的这一观点，确定《学而》篇“所记多务本之意，乃入道之门，积德之基，学者之先务也”（同上第47页）。翻开朱熹的著作《四书集注》等，采用游酢的言论多多矣。

三、以儒知禅融佛的理学思维方式

有谓游酢靠近佛教禅学，由此后儒冷落游酢思想。这个问题是重估游酢思想的一大障碍。此亦是对游酢思想未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所致。

就对佛教禅学的态度和认识上看，应把游酢思想分成前后两个时期。游酢早年确实对禅学发生过浓厚的兴趣，曾有一定的信仰。但是，他实践证明，禅学是行不通的。对此，他的老师程子有明确的说明。程子说：“游酢、杨时先知学禅，已知向里没安泊处，故来此。”（《二程集》第38页）这里是说，游酢知道禅学里“没安泊处”后，便去拜二程为师，从佛学转移到儒学上来。游酢二十岁认识程颐，二十六岁拜二程为师，二十九岁时又带杨时师事二程。上引程子谓“故来此”，应在其三十岁以前。

对子游酢思想的这种转变，朱熹是知情的，也曾隐约肯定的。朱熹所编《伊洛渊源录》卷9《吕氏杂志》中有曰：“游定夫后更为禅学。大观间，本中尝以书问之云：‘儒者之道，以为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朋友、兄弟，顺此五者，则可以至于圣人。佛者之道，去此然后可以至于圣

人。吾丈既从二程先生学，后又从诸禅老游，则二者之间，必无滞阂。敢问所以不同何也？’游文答书云：‘佛书所说，世儒亦未深考。往年尝见伊川先生云：吾之所攻者，迹也。然迹安所从出哉？要之此事须亲至此地，方能辨其同异，不然难以口舌争也。’“大观”为北宋徽宗年号，为1107—1110年，其时游酢五十六、七岁，应属晚年。“更为禅学”，应理解为对禅学“深考”，即深入进行研究。

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释、道义理，是宋明理学家的一般思维模式。游酢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，不仅无可非议，还应该加以肯定。他认为，理学家们要复兴儒学，要从佛教手中把中国文化的主导权夺过来，儒学必须吸收佛学中一些成分以充实自己。这就是游酢所说的儒不接触佛书是不行的。也就是俗谓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”，不然“难以口舌争也”。他是有所指的，他的老师程颐攻佛言论最烈。他说：“先生（指程颐）不好佛语。或曰：‘佛之道是也，其迹非也。’曰：‘所谓迹者，果不出于道乎？然吾所攻，其迹耳；其道，则吾不知也。’”（《二程集》第69页）此为游酢所录程颐语。在程颐看来，佛之迹出

于佛之道；而其又只攻其迹，不究其道。游酢认为，这是对佛学“未深考”的结果。游酢说：“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，故詆之如此之甚。”（《答吕紫微》、《游定夫先生集》卷7）显然，游酢不是信奉佛教，而是如何批判和吸取佛理的问题。如果对佛学没有深入的体验，是无法辨别儒佛异同的。他是在对佛学进行深入的研究，以便儒学对其进行吸取，实现儒佛融合，形成理学。

综观游酢的著作，很难找到他信仰禅学的言行，反而有不少他强调要严加区分儒、佛的材料，认为二者不能混淆。例如，他说：“儒者，守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各尽其分，罔有不合道者。释氏谓世间虚幻，要人反常合道，旨殊用异，而声可入、心可通，此其说之谬妄矣。吾道岂若是哉！敢以管陈白。”（《答吕居仁辟佛说》，同上）

四、游酢思想未得充分传承的原因

由上可见，福建理学主要是由游酢和杨时两人创始的。而后世杨时享有重名而游酢罕为人知，还有其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。

游酢卒于北宋灭亡前三年（徽宗宣和五年，

1123年），其活动时期正是国家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，人们无视思想理论问题，游酢及其弟子无人过问，因而其思想得不到系统的传授和发扬。

相反地，杨时卒于南宋建立后的九年（高宗绍兴五年，1135年），其在世时，为了重整国家，不同阶层和阶级的人们都十分重视思想理论问题。杨时仕于朝，曾被皇帝选为侍讲和担任其他要职，他提出激烈的抗金主张，并奔走各地游说，有了广大的民众基础。杨时弟子一千多人，再传弟子李侗、刘勉之、朱松、刘子翬、朱熹、张栻等，在学术和政治上地位都很高，有广泛的影响，因而使杨时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，

（刘光舟先生所撰《游酢与杨时比较谈》，从其家庭、为学从政、居乡短长、性情意向等诸多方面分析，深刻细微，合情入理，我都赞同。我只补充上面一层意思。）

五、游酢思想是中国文化南移再兴盛的源头

从隋至唐中叶，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后期过渡。适应社会性质变化的需要，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也开始改变为理学（新儒学）的形式。儒家思想的这种发展，是以中国文化重心由北至南转移

然后再在全国而实现起来的。游酢、杨时等把洛学移植到福建等南方，发展为闽学，由闽学再全国化、东方化、世界化。因此，游酢、杨时的思想，应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。他们思想的这种伟大的文化意义，南宋理宗皇帝已有所认识，称之为“皇天眷命，泰运南移，祈我邦国，亿万斯年。伟哉圣道，先载南传。允矣君子，德业精专，春光融融，秋月娟娟。泰山之峻，河海之渊，先生风教，丽日中天。四方其顺，朕有赖焉”（《赠游酢》，《游酢研究》第1辑第20页，1993年12月）。

理学形成于北宋。理学的前驱者是胡瑗、孙复、石介，发展者是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，以及邵雍等。理学的主要著作，如胡瑗的《周易口义》，孙复的《春秋尊王发微》，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，程颢的《明道文集》，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，张载的《正蒙》、《经学理窟》，邵雍的《皇极经世书》，等等，都是在北宋形成的。上述理学的奠基者大都生活在北方，因而其思想开始流传亦在北方。

但是，在北宋，特别是在其后期，北方全人等少数民族不断的入侵，以至灭了宋朝。他们文